

■ 新作聚焦

# 欧阳娟长篇小说《天下药商》： 平凡中的惊艳 微波下的潜流

□白庚胜



《天下药商》巧妙地选取了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这一主题,小切口、大立意,既符合主题创作的精神,又规避了正面强攻的生硬。通过文学书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两个结合”创新理论的应有之义。

走过了不知多少座古桥、多少条古道,辨认过不知多少座老墓碑上的文字。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大到战争的时间、地点、作战方式,城池的规模、构造,交通的路线及出行方式,七品以上官员的生平要事;小到药栈的结构、建材、雕花,人物的衣饰、发型、食宿(甚至包括衣物的布料和药工们吃饭住宿的方式),都有据可查。《天下药商》体现出的品质,佐证了这段发言的真实性。

尤为可贵的是,一应民风民俗的描写,都像空气一样被作品吸入了体内,不是强行贴在表面的画皮,而是进入了骨血的精髓。比如有关出殡的场面,作者先以一连串打棰鏢样的鞭炮,形象地表现出男主角黄武全的惊愕与迷茫。再以驱疫时的一连串动作,不动声色表现出女主角夏槿篱的机敏。当夏槿篱的傩面被强行掀开时,男主角与女主角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碰面。从青面獠牙的面具后,展露出一副强健、镇定的少女面容,令人印象深刻。民俗的演绎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整个场面错综复杂,紧张而又热闹、克制而又奔放、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欧阳娟真正做到了将民风民俗的还原性刻画与情节的推动及情绪的起伏完美交融,交相辉映。

那些平凡中的惊艳,微波下的潜流,一花一世界的绝伦,盘曲幽邃的神妙,成功路上的命运多舛,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等,悉数汇集在欧阳娟笔下。作家通过历经多年的阅读、思考提炼,将一部多层次、多角度、甚至是多维度的煌煌巨作写出了信手拈来的感觉。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文化深度、生命力量,藏而不露地浸透着作家对故乡深深的爱及理解,对故乡人民及其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樟帮药商的人道根本、智勇光彩、义利并茂、和合精神,折射出中医中药以人为本、理义辩证、药医同构,中华民族仁爱智慧、坚韧卓尔、生生不息的丰厚内涵,以及中国人民的和美之心、温雅品质、从容气度。樟帮药商的遍迹天下、名满天下、泽被天下,令人叹为观止,真正体现出“天下”药商的中国价值、“天下”意义及作者写作技巧的非凡功力。而这正是中华儿女在共同建设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所期盼看到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 第一感受

最近这两年,据说李宏伟经常在宋庄一带出没,身边的朋友几乎都被他邀请过去宋庄看一些艺术展览,也邀请过我几次,不过我个性疏懒,一直没有成行。有时候也许有一种对当代艺术的“恐惧”,这种恐惧叠加了早年几次宋庄行留下的失望阴影,如此构成了我一次次的延宕。但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和当代叙事密不可分,共同承担着观察时代和建构人性的功能。我在疫情前看过艺术家耿雪的一次作品展,其中的“陶瓷系列”呼喊着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叙事冲动。疫情后我又在上海龙美术馆看了张晚刚的“蜉蝣”系列展,画作里面的压抑、无助和绝望恰恰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当我拿到李宏伟的新长篇《信天翁要发芽》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内嵌着当代艺术精神的叙事作品。虽然因为我的延宕无法确认李宏伟在宋庄究竟习得了什么,我对作家的私人生活也从不感兴趣,但是就《信天翁要发芽》的文体、主题和文本而言,它与当代艺术——这么表述或许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表述也许是——经过当代转化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这一共生中,《信天翁要发芽》构成了一个我称之为“装置性的表演文本”。

《信天翁要发芽》由四章构成,分别是“第一场 情势表演”“第二场 立身表演”“第三场 辩证表演”以及“垫场 劳作表演”,仅从章节的题目我们就非常直观地看到整部小说的核心结构形式:戏剧表演。但这一戏剧表演并非传统的以对话和角色为主导的演出剧本,而是一种经过本质化或者存在论处理后的叙事体式,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小说反复借助将军之口强调“开始你的表演”,但整个表演是经过转述之后的一种生活图景,而非是惯常戏剧所必须依赖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信天翁要发芽》要表达的冲突是一种升格后的具有宗教指向的存在论冲突,即在不自由的社会秩序中,人/信天翁如何才能获得生命的自由?如果我们深究这一表演,会发现这部小说结构的第二个层次,即整个叙事图景的呈现都受制于一个装置,这个装置类似于戏剧表演的舞台,但在小说中并不具象,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情势/时世”。一般来说,当代装置艺术高度依赖于具有流动性的空间,通过流动性的加入,装置才能获得其功能并完成其艺术性。《信天翁要发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它是一个完全隔绝的装置,仿佛是有个巨大的铁栅栏(那个天神一般的存在?)罩在所有的人、物、场景、语言上面。也就是说,流动性的装置变成了隔绝性的装置。从西哲的角度看——请注意李宏伟的哲学研究生知识背景——这里有一种黑格尔式的冲动:通过隔绝获得一种存在的内在性。表演与观看、监控、全景式透明社会共生,但隔绝却要躲藏、隐藏、压抑,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获得存在的坚决和神性,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此在获得存在神性的通道一是内省,二是劳作。但李宏伟是一个小说作者,在哲学止步的地方,叙事的力量汹涌澎湃。这是《信天翁要发芽》的第三个层次,叙事者以一种生命性去黏合哲学存在论的二元对立,在生命里没有二元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倒置《信天翁要发芽》的阅读顺序:从垫场读起,也许就会有更愉悦的身心体验。

在“垫场 劳作表演”的最后一段,小屋被火焚烧,然后两只信天翁冲天而起——这是波德莱尔笔下垂死的信天翁的一次重生?犹如郭沫若火中涅槃的凤凰?——并留下了三句密语:“人在事上发芽”“人在世上发芽”“人在时上发芽”。这三句密语也是阅读《信天翁要发芽》的三根密钥。“事”意味着事功,“世”意味着存在,“时”意味着时势。事功存在——时势,这三者形成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主体由信天翁变成了人,信天翁/人(要)发芽者中的“要”被删除或者悬置,“要”不过是一种欲望,表演也是一种欲望,欲望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习得了这种法则并将其建制化,将军和叙事者“我”(“我”在小说中从未出现)都是这一建制化的极端代表,也是威权的一体两面。而叙事本身则是解构性的,它将“要”的欲望祛除,只有经过这种祛除,自由的生命状态才是可能的。这可能是《信天翁要发芽》在存在论和叙事论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但需要提醒的是,以黑格尔式的隔绝装置去获得这种自由状态其实是一条“危险的窄路”,这和深渊的凝视者面临的是同样的两难,这两难的解决,哲学只能通过哲学,小说只能通过小说,但前提是,必须充分占有所有可能性的思想和尝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一个装置性的表演文本

□杨庆祥



《信天翁要发芽》,李宏伟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天下药商》是作家欧阳娟最新推出的长篇佳作,洋洋洒洒65万字,以明清初樟树古镇自然、社会、人文为背景,执婉约之笔、借生动故事,精雕江右商帮中樟帮一脉以药为业、安生、立命、传情、树魂的创业史、心灵史,细腻近古时期赣中地区的风俗画卷、生活现场、生命际遇,深刻揭示了樟帮药商独树一帜、惊艳天下的中药材炮制技术、社会精神形成原因以及发展历程。

作品以侯仁棣大小姐侯静仪跟随药栈学徒张宝祥上山采摘金樱子为起点徐徐展开画面,一派壮阔如天地笔墨绘出的写意画、细致如工笔花鸟小品的自然风光随之呈现,极具镜头感。摄影画面般的文字,带出一幕幕手工炮制中药材的独特技术,如:荷包金龟、白芍飞上天……樟树市之所以成为中国药都的谜底渐次揭开——当地并非以药材产地闻名,而是以精湛的中药材炮制技术立世,数十味药材详尽的炮制过程,让整部作品弥漫着草木之香,充分体现出中医中药之美。

史料记载,樟帮药商从偏安一隅发展到遍布天下的时期,正是天灾、瘟疫、战乱频发的明清初。百业凋零之际,樟树人何以逆流而上,将当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天下药商》将四位青年男女的创业史与感情纠葛融为一体,生动、具体、深入、富于逻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灵活中有所坚守、退让中伺机而动、精于算计却又诚信为本、明哲保身却又胸怀天下,这种看似矛盾的精神,形成了樟帮药商进退有度、百折不挠、合作共赢的处世态度,也因此才能抵抗天灾、瘟疫、战乱的侵袭。这个答案,也是作者提炼出的樟帮精神。小人物面对大时代的轰然而至时所迸发的处世智慧遍布全篇,从中还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智慧也是樟树人得以在艰险的时局中走遍天下的重要原因。

不同于以表现晋商创业历程为主要内容的《乔家大院》和以徽商为创作主体的《胡雪岩》,《天下药商》是以樟帮药人整个群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为书写对象,通过群像的刻画,反映江右商帮中樟帮药人这一特定群体在当时当地的总体发展面貌。《乔家大院》《胡雪岩》两部作品皆以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为依托,折射出当时当地的商业发展概况。其他同类型的文学及影视作品也大抵与《乔家大院》和《胡雪岩》相似。如果说以《乔家大院》《胡雪岩》为代表的同类型文学及影视作品表现的是能人的创业史,《天下药商》表现的则是普通人的创业史,前者着重展现的是某个“英雄”对行业的影响,而后者锁定的是无以计数的“小人物”如何前赴后继推动行业的发展。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正需要《天下药商》这样“去英雄主义”的人民主体性文学精品。

主题创作和主题出版,是当今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的风向标。《天下药商》巧妙地选取了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这一主题,小切口、大立意,既符合主题创作的精神,又规避了正面强攻的生硬。通过文学书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两个结合”创新理论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有意识地注入了鲜明的现实意义。鉴古是为观今,作品详细记录了青蒿绞汁治疗疟疾的方法,既是对2015年中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及其团队致敬,也是对中医药学的深情礼赞。作品中充分肯定和反复提及的开拓、创新、共赢等创业精神、仁义、守信、济世等价值观,还有面对天灾、瘟疫、战争时所迸发的生存智慧,放在当下乃至未来同样适用。这正是《天下药商》作为主题作品的闪光之处和意义价值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小到一把药刀、一道药膳,大到一场战争、一轮疫情,作者用笔兼具了细腻与跌宕的双重特性。例如:写到老药工侯秋林切药时,药刀反射的

光泽、手臂渗出的汗珠,都以平实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而药刀一旦开始发力,语言风格陡变,富于冲击力的措辞给人带来巨大的力量感和速度感;再如,写到决战赣州府时,绳索摩擦在城墙上的声音、嫁衣抖散开来的艳彩,一切琐碎而宁静,俄而,喊杀声大作,炮火轰塌了城墙,人死如麻。语言在风平浪静与翻江倒海中切换自如,形成极具辨识度个人风格。这种语言风格,让小事不再小,大场面不至于空,小事物体现出大文章,大场面有血有肉有筋骨。同时形成了富于变化的节奏感,读来一波三折。

准确而丰富的心理描写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樟帮药商为何谨遵仁义、济世的古训?是空喊口号,还是身体力行?是道德绑架,还是经验之谈?作品通过黄武全从一个自私自利的“聪明人”成长为众口相称的“大善人”,并因此缔造出自己遍布天下的药庄、药栈的过程,深刻展示了仁义、济世于人于己的意义,逻辑严密地论证了“天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黄武全的心理变化,仁义、济世的古训,从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道德绑架的符号,变成了他心目中可知、可感、可行的真理,从而以点带面地反映出仁义、济世的古训在樟帮药人中传承千年而不衰的因果。除此之外,作品还通过心理描写塑造出近十类人物性格发展的源动力,映衬出多姿多彩的亲情、友情、爱情模式。

夹杂在樟帮药商气势磅礴的创业史和婉转含蓄的人情事中,还有一处引人注目的亮点,那就是作品中星星点点的民风民俗。多年民间文化研究经验,让我具备了鉴别民风民俗描写是否真实的眼光。《天下药商》所涉一应民风民俗,基本都是还原性刻画。有关药商的描写自不待言,这是作品的主体,作者也在多种场合提起过,所涉一应中医药文化知识都来自于实地采访或资料记载。更为不易的是,作品中的其他民俗,也悉数经过考证。比如故事临近收场时浓墨重彩表现过的偷梁、上梁的风俗,从偷梁的讲究到上梁的喝彩词,都与民间流传的一致。从中足以见得欧阳娟做过多少田野调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她曾在作品首发式的发言中提及,为了让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能够站得稳,她采访了近百位老药工、药商及相关从业者,翻阅了堆起来比人头还高的资料,啃下了数十本地方志、家谱,

■ 评论

## 小说如何记忆历史

——沈杏培《印痕与记忆》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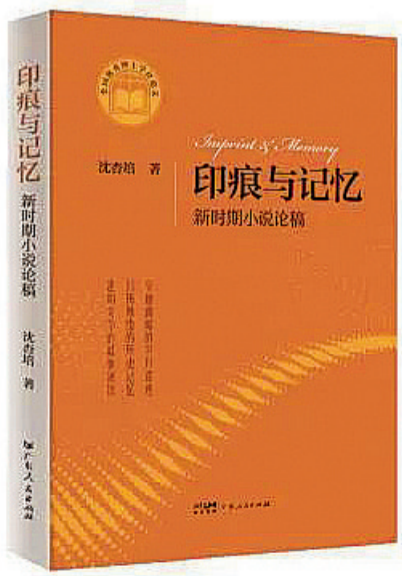
□谢亚丽

影响下,作家书写历史记忆对应产生主动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心态,由此促发了诸如文学策划、畅销书机制等新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呈现出追求流行、媚俗的新变。在用代际文化这一视角来分析作家各自历史记忆小说时,沈杏培考量了代际文化视角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历史记忆小说的便利性和合理性之外,还反思了这一视角用来解读历史记忆小说的有效性。本身具有的含混性以及提醒人们警惕其在使用过程中绝对性,而要注意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避免笼统地将一些本不属于代际文化的现象和问题囊括进去。

同时,该书又从共时性的维度,横向探究了同一时期海外华文作家如何叙述这段历史记忆。沈杏培显然是考虑到关于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言说和形象是在自我和他者双重视角下共同建构这一点,因此有意识地将海外华文文学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记忆置于跨文化的视野之中。何况,海外华文作家们独特的人生体验致使他们切入生活的角度与本土作家不同,因此用跨文化的眼光审视他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将这

一问题的研究疆域扩展到海外,既纠正了历史记忆小说的研究地图,从而让这段历史的复现更加完整和鲜活,又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记忆叙事所蕴含的内在丰富性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理论诠释。

历史记忆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需要严格界定,比如,记忆什么,谁来记忆,怎样记忆,形成了怎样的记忆伦理,有无形成某种记忆机制,影响记忆的因素有哪些,当代中国作家历史记忆的范式和特点是什么,是否存在记忆的记忆盲区或历史观上的偏狭等。这些问题,在该书中得到了较好的阐释和论证。作者提出和反复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即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是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主要叙述内容或者受其影响的相关文本,这并不单单指全文或者大部分描写这段历史的小说,而是在思想上、语言上、创作思维上受到其影响,或者在某一部分涉及到与联系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和背景的小说。这种概念囊括了不少原本被排除在历史记忆小说之外的文本,极大丰富了历史记忆小说的范畴和文本容量,冲击了以往人们对于历史记忆小说及其书写的历史所形成的



《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沈杏培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

刻板印象,并且构成了对以往历史记忆小说塑造的受难者形象的审视。

《印痕与记忆》还单设了一章阐述历史记忆小说逐渐脱离言说规范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形态,如将历史背景化而重点叙述人物文化心理的寻根小说、一部分用先锋形式来包裹历史的先锋小说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将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放在不同文化视野下进行观看,探究历史记忆小说在政治文化、消费文化和代际文化下

分别是何种形态,这一发散思维所注意到的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的多样化书写唤醒了读者和学人对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更为全面的理解和接受。

坚持追问文学之“变”与“由”的学术理念在《印痕与记忆》一书中得到了自觉的实践,作者尤为注重分析哪些因素帮助形成了历史记忆小说,即“存在之由”,并力图明晰历史记忆小说的叙事在不同阶段发生演变与变迁的影响因素,即“变迁之故”。“追问”是抵达“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的必经之途,这一词频繁地出现在该书中,除了自身的用词偏好与语言习惯之外,显示的是作者厚重的问题意识。著作里有不少具有追问特性的表述,如将历史记忆小说较为集中地框置于文学本体研究的范畴上,还会不断追问在这些问题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社会因素、审美观念、历史意识、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力量、作家文学观的变迁;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忆小说创作状况时,追问历史记忆小说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启示?这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哪里?历史记忆小说的内在困境和缺陷何在?这些问题在书中基本上都得到了细致而清晰的分析。这种学术思路彰显了沈杏培注重追问研究对象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的学术理念,体现了其对该段历史和历史记忆小说进行辩证考量的严谨态度,进而不断追问新时期历史记忆小说发生的“历史现场”。可以说,该书通过对新时期到新世纪40余年当代作家历史记忆的多维度考察和勘探式追问,建构起了一座关于当代作家对中国特定社会阶段的历史记忆的文学展览馆。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